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清代全史

(第九卷)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一本卷主编／徐彻 董守义



方志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清代全史（第九卷）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本卷主编 徐 彻 董守义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全史. 第9卷 / 徐彻, 董守义主编. —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7.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80238 - 025 - 7

I. 清… II. ①徐…②董… III. 中国 - 古代史 - 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750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

清代全史 (第九卷)

本卷主编: 徐 彻 董守义

责任编辑: 颜伦琴

出版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2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 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96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238 - 025 - 7/K · 797 全套共 10 卷 定价: 56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再版前言

《清代全史》1993年7月初版，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版纸型进行过少量挖改。其实在1993年7月之前，1~6卷还印过一次，所以有的书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1991年7月第一版”及“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版，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但在和出版社洽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作修改。这倒不是自认为没有修改必要，而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间。与其匆匆修改，不如不改。当年同甘共苦的同事，有7位已先后离开我们，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手来修改旧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有新的突破。经过十几年的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代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虽然都不是通才，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分工承担《清代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能反映那个“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由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作。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1987年起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当时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的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都是两人一间，吃饭都在近代史所食堂。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稿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所有撰

稿人除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艰难玉成了我们，也是前辈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国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清代全史》就这些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至于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翘首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民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而且最复杂的问题。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清代全史》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多方面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叙述。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三的篇幅叙述清代的经济，而且是由长期研究清代经济的专家们撰写的。广泛涉及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区域经济、部门经济、行业经济，边疆经济开发，以及对外贸易，都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在《清代全史》立项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习惯于把清史的下限定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由于这个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余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作为断代史的清史问世。而中国近代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以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结构。《清代全史》作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奉献给读者，首先必须突破多年来形成的近代史模式。这种突破，其真正意义在于为此后编写完整的清史断代史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见解。

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优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内有长期的积累，有较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作为起点，为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因素，最主要困难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如何消除分歧保持一致。我们在摸索中采取了一种办法，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召开分卷主编会议，并邀请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讨论涉及全书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亮明各自的观点，发现分歧所在，寻求协调一致的途径。现在看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我们也碰到过一些虽说不大但很难办的问题。外国国名、人名、地名、书名，兄弟民族族名、人名、地名、书名，有各种不同译法，史籍中各行其是，很不一致。凡加了引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改的。但对兄弟民族的蔑称所加的“犛”字偏旁，对外国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字偏旁，我们径直改正不加说明，这是学界惯例。但有一些译名，例如人名，哲布尊丹巴，又称哲卜尊丹巴，又称折卜尊丹巴，也称泽卜尊丹巴。再如地名，“勒通”藏语汉译为理塘，又译里塘或李塘。再如国名，现称俄罗斯，过去称鄂罗斯，或称罗刹。如果以为“罗刹”不雅（特别在佛经里）改称俄罗斯，那《平定罗刹方略》，该改成什么书名？如何全书保持一致，有惯例可循的好办，没有惯例可循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一致。我们遵守了这一规则，却违犯了另一规则，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撰稿过程中，我最忧心的是学术质量问题。待到快要完稿时，我最忧心的却是出版问题。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时期，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申请出版补贴那时还没有先例。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慨允资助出版。现在想起来，当初如果不能出版，几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代全史》再版时，饮水思源，我们要对辽宁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再版，需要重新录入，进行电子排版，编辑工作，一切从新开始。但在电子排版中存在一键之差，往往错成一片的情况。工作量大，时间紧迫，方志出版社的李沛同志、徐宏同志和颜伦琴同志，为此书的再版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日也要继续工作，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真诚的敬佩和感谢。

王戎笙

2007年3月13日

前 言

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 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写一部 1000 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订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 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纂规划。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 1983 年起，到 1990 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 8 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十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 20 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代全史》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洵、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宓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的在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

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过程，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袁闾琨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0年7月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光绪前期政局	(11)
第一节 光绪初年的政局	(11)
第二节 慈禧太后的独裁	(22)
第三节 光绪皇帝的亲政	(29)
第二章 边疆规复与开发	(35)
第一节 西北规复与新疆建省	(35)
第二节 台湾建省与建设	(47)
第三节 西藏问题与西南改土归流	(56)
第三章 从唇亡齿寒到瓜分危机	(63)
第一节 清朝与周边友好国家的关系	(63)
第二节 中法越南交涉与战事	(74)
第三节 中日甲午战争	(83)
第四节 瓜分危机	(105)
第四章 政体改革一波三折	(118)
第一节 光绪变法	(118)

第二节 庚子事变	(152)
第三节 慈禧“新政”和“预备立宪”	(184)
第五章 光宣军事制度的变革	(219)
第一节 “防军”与“练军”	(219)
第二节 编练新军	(221)
第三节 重建海军	(239)
第六章 光宣思想文化的流变	(250)
第一节 思想的嬗变	(250)
第二节 文化中的新旧杂陈	(286)
第七章 清帝国的崩溃	(324)
第一节 宣统政局	(324)
第二节 清王朝统治的总危机	(335)
第三节 帝国崩溃	(355)
后 记	(362)

绪 论

本卷叙述光绪元年（1875 年）至宣统三年末（1911 年）37 年间清王朝的政治、思想、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历史。一部清史，不同于以往任何王朝史，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解体的全部轨迹。光、宣时期是这个解体轨迹的终结段。

历史进入 19 世纪，古老的中国已经在封建社会中蹒跚地行走了两千余年。有识之士龚自珍还在道光朝就发出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哀叹。这是哲人对末世厄运的预言。不过，清王朝在遭受了咸、同时期“内忧”和“外患”的沉重打击后，却奇迹般地存续下来。于是，封建统治者额手相庆，把这称为“同治中兴”。其实，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构成社会总危机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在新的形势下，旧矛盾以新形式表现着，新矛盾也层出不穷。

所谓新的形势，主要是国际上西方列强在 19 世纪 60 ~ 70 年代先后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对华侵略由主要是商品输出转变为加强资本输出，东方的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疯狂参与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殖民争夺。在国内，随着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大起义渐次失败，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走向沉寂。

这样，在光绪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又重新上升起来。诸如，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斗争，慈禧集团与恭王集团的勾斗，湘系与淮系武装集团的倾轧。在被统治阶级中，农民阶级及其他民众反外国教会的斗争此伏彼

起，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设厂以及中国近代工矿业兴办的兴起，诞生了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并出现了早期的自发工人斗争。

到光绪中期，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邻邦和我国边疆地区的殖民侵略和瓜分，又使一系列矛盾更加激化，更加复杂。例如，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政争与和战之争交织，湘淮两大集团的畛域之分与帝后党争关联，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封建守旧派的变法斗争与帝后党争相因应，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逆流曾经一度汇合。

光绪后期至宣统时期，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集中表现为与其代理人——清政府的矛盾斗争，其中包括广大农民阶级的抗捐、抗粮及“扫清灭洋”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大搏斗，资产阶级立宪派向封建统治阶级争夺参政权力的斗争，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关于要不要粉碎帝制的论争。此外，还有中央集权与督抚分权的矛盾，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破裂，以及清政府在对帝国主义全面屈服的同时也还有局部抵制，等等。

所有这些，构成晚清历史的矛盾纷呈、波谲云诡、风雷激荡、色彩斑斓的全息立体连环画卷。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矛盾的总爆发中耗尽了最后的精力。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帜取代了大清帝国的龙旗。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制度的国家。

二

封建专制国家具有双重职能，即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与对外抵御侵略。光宣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鹰瞵，瓜分豆剖之势直接威胁到清帝国的生存。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惊呼中国已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把同治初年开端的“自强”新政的政策重心由“平内乱”转向“御外侮”。从此，在中国大地上除了继续经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外，又兴起了一系列以“求富固本”为目标的近代民用工业；敷设并开办了一些旨在加强国防机动能力的铁路、轮船和电报事业；陆续设立了一些教授先进科学技术的近代学校。为了抵制沙俄对新疆地区的侵略，清政府派遣左宗棠规复西北，派崇厚和曾纪泽先后赴俄交涉并索回被占领土伊犁，在新疆改设与内地相同的行省制度；为抵制日本对台湾岛的侵略，派遣沈葆楨带兵轮巡视台湾，逼走侵台日兵，将台湾行政升格为省制，由刘铭传为首

任巡抚，进行区域性近代化建设的试验；为抵制英国对川藏地区的觊觎，清政府在川滇开展改土归流运动，为民国初年的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

然而，洋务派的危机感以及为应付危机而进行的新政并没有为全部统治阶级所认同。他们开展的各项改革都遇到重重阻力：“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絀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情。”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新政建设，当然不会有可观的效果。

统治阶级中的另一些人看到了列强虎视眈眈的险恶形势。但是他们以为只要中国能够振纪纲、端风俗、正人心，就可以恢复封建的一统天下。他们根据传统观念批判自强新政，“往往陈义甚高”，自视为“清”流，而把干实事的洋务派视为“浊”流。这些人在统治机构中多居言官清要地位，对于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事成则求全责备，事不成则追究改革的责任而将破坏者轻轻放过。这些人又被称为“清议派”。

问题在于，清议派总是“正确的”，总是振振有词。当他们反对兴办海防、建造军舰、购买新式武器时，说中外既经议和，“何必为此猜嫌之举”，好像他们很珍惜和平，也最怕浪费国帑。当中外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又马上站在主战立场上，指责洋务派的折冲樽俎和审慎交涉为“畏葸”，主张不顾实力的跨海东征，“直捣夷巢”。当他们反对架设电报，促进信息手段近代化时，理由是这会破坏风水地脉，致令民情不安，似乎其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秩序。当他们阻挠修筑铁路时，理由更奇妙，诸如造路会滋扰民间，造成骚动呀！造路虚糜帑项，致使民困国乏呀！即使能致工商繁茂，却更将吸引洋人前来呀！中国人自私分散，铁路纵然造成也终将难于保护呀！一句话，他们以不适合“国情”作为保护旧事物，反对新事物的借口。

问题是复杂的。清议派不仅反对改革，有时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中的违制行为，甚至连慈禧太后重治宫禁守卫人员、偏袒太监以及大修颐和园也遭到他们的有力批评和抵制。这些批评也是根据祖制或传统道德戒律而发的，但是确实起到了纠弹时弊、端正吏治、抑制腐败和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清议派的议论有时还与中华民族反帝爱国要求相一致。他们在帝国主义威胁和侵略面前主张奋起抗争。主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这使清议派赢得了历史的荣光。一般地说，清

议派无拳无勇，因而是脆弱的。当中外战云密布的时候，他们慷慨言战；当强敌压境时又大惊失色，在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福建海疆的清议派大员一闻炮声，即先逃跑；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原是清议派重要成员的吴大澂统率辽东战事，“徒托空言”，遇敌即溃。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清议派人物如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也能够团结前敌将帅，促成著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一般地说，清议派鄙薄洋务以为不足道，但后来也有些清议派人物很重视洋务，如陈宝琛、宝廷、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等，一旦掌握了方面大权也直接办洋务。一般地说，清议派对洋务派开展的守势外交的批评有些不顾实际，对世界大势失于无知，但他们的义正辞严的主张有时也使洋务派唯恐对外让步会被他们“夸大加以攻击”，而不得不在交涉中表现出某些“不妥协的精神”，这集中地表现在中俄伊犁交涉中。

就是说，清议派虽然干扰了洋务新政的实施，却也发挥了某种纠弊补偏作用。洋务派虽然讨厌清议，有时又联合清议派共同向腐败政治作斗争，何况洋务派自己也不能避免腐败。慈禧太后虽然利用清议派监督和限制洋务集团，但也讨厌清议派妨碍其奢侈腐化。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可以视为“制衡”机制。后来，慈禧太后罢黜了奕訢为首的全体军机，又沉重地打击了清议派并使之风流云散，这种“制衡”机制就破坏了。从此，言路萧条，慈禧太后走向独裁统治，国事日非，却无人能匡救弊端。

三

“大清帝国”是由清太祖和太宗时期开基，经过康、雍、乾三朝大力开拓而成的多层次封建大帝国。它包括满族统治者所由以兴起的中国东北部和原来明王朝统治的中国本部；蒙、回（又称新疆）、藏广大地区；周围一系列有朝贡关系的属国等三个层次。

光绪年间，帝国主义加紧对清帝国藩部和属国的侵略。清政府采取的应付方针是：坚决保守藩部，量力保护属国。

蒙古、新疆、西藏在清代称为藩部，是清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次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渗透。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派左宗棠规复新疆，改建行省，大大地强化了中央对新疆地区的统一领导，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地挫败了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侵略野心。对于内外蒙古，清政府继续清初以来与蒙古王公的政治联姻，

政策是成功的。终清之世，内外蒙古王公虽然受到沙俄挑拨，到底不肯背清事俄。对于西藏地区，英帝国主义不仅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居然派兵入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肢解出去。清政府一面与英印当局交涉并签订条约，应允其部分要求，撤废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军压力下签订的非法条约，一面实施“固川保藏”方针，派内地军队入藏，抵御英印当局。与此同时，清政府曾力图在西藏实行改革，后因清帝退位而未果，但毕竟挫败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同时也继承并发展了封建大国主义传统观念，称中国是“天朝上国”，大皇帝是天下的“共主”，而把中国周围的国家称为属国。实际上，清政府依自己的统治力量所及的程度将这些邻国分为不同层次，对于军政力量影响不及的国家虽也列为属国，实际上平等对待；对于军政力量影响所至，表示臣服的国家列为朝贡属国。清政府与朝贡属国的关系是封建的宗属关系，这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于殖民地的关系有本质不同。清政府只要求朝贡国承认中国为“上国”并自认为“属国”，其国王的更迭以取得大清皇帝册封为合法，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方物，清政府则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给予经济上的实惠，而不过问该国内政外交。这在本质上是以前不平等的封建宗属关系维系的友邻政策。然而，封建的属国政策在帝国主义面前因不合时宜而又力所不逮，连遭败绩。

苏禄、琉球等属国孤悬海外，当其被帝国主义占领或吞并时，清政府鞭长莫及，未能给予实力保护。下缅甸、越南南圻六省及哲孟雄遭到侵略，清政府也未能及时注意。只有当越南北方和朝鲜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政府才声明此系中国属邦，并以此理由出兵保护。帝国主义却以该国既然内政外交不由中国操纵而否认其为中国属国，并悍然出兵占据。封建的宗属法则在殖民主义逻辑面前方枘圆凿，一窍不通。

事实上，尽管许多朝臣要求出兵保持宗主权，而清廷之所以出兵主要是出于“唇亡齿寒”的忧虑。中国和越南以及中国和朝鲜之间都是山水相依的千百年来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友好邻邦。而且，很明显的是侵越的法国意在中国西南，侵朝的日本意在中国东北。所以，保护越南及保护朝鲜既是保护属邦，又是自我防御。这两种意义是统一的。在流行的中外史学著作中，认为中法和中日之间的这两场战争不是为争夺属国而战，或者只是为争夺属国而战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战争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大部分时光在和平中度过。但战争又是

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是对和平时期政治制度、方针、路线的全面检验。

帝国主义对清帝国的侵略由沿海沿江及于藩部，又及于周围属国，同时又加深对内地的侵略。这是全方位侵略。清帝国在对外妥协的同时，也进行过一些本能的反抗。在沿海沿江，它被迫开放一些口岸，但仍节节抗拒，它被迫放弃了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在藩部，它失去西北地区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到清亡时又失去科布多和乌梁海地区，但它仍保有蒙古、新疆的大部和西藏地区。在一系列属国方面，它虽然失去了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众多的朝贡国，但清亡时仍保有对廓尔喀的宗主权。在朝鲜，它曾连续挫败日本制造的壬午、甲申两次兵变，把日本的侵略战争推迟10年；在中法越南之役中，福建水师虽被偷袭而覆灭，而陆军则以战胜者姿态收兵，签订了一个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不赔款条约；即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北洋海军也还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陆军在局部战场也有一些小胜仗。

这些，都说明同、光以来实行的洋务新政使清帝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两次鸦片战争中那种“形同木偶”、“有海无防”的状态已经有所改变。然而，这些又说明封建帝国同资本帝国主义的搏斗多么力不从心，藩部剥损，宗属体制瓦解。而列强则来势汹汹，踏破藩篱，深入堂奥，掀起了瓜分狂潮。八旗劲旅“无敌天下”的神话早已粉碎，“天朝大国”的声威荡然无存。整个中国面临亡国危机。

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洋务派那样枝枝节节的改革无补大局，必须全面改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维新派则倡言：全面改革必须从政体改革这个根本问题入手。

要改变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谈何容易？因此，这个更高层次的改革呈现一波三折的景象。

四

戊戌维新运动是政体改革的尝试。

资产阶级维新派批评洋务派，但并不反对办洋务。维新思潮对洋务思潮的扬弃首先是继承和发展，然后是质的转换。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维新运动中一些洋务派人士也表现出相当的热情。

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根本区别在于要求君主立宪。维新派企图走俄、

日道路，特别是日本式的拥护天皇进行变法的道路，以为“法自上变顺而易”。可是，光绪皇帝只是一个“想有作为”的皇帝，在他背后有一个死死抓住大权不放的老太后，这使他无法做中国的“明治天皇”或“彼得大帝”，反倒做了中南海里瀛台的“囚君”。康有为等维新领袖也没有成为伊藤博文，尽管他们很崇拜他，想以其为楷模，但是机遇和学识都不如他，而不是勇气不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认为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而改良主义只懂得用和平手段乞求改革，云云。其实，康、梁等人在变法时所缺乏的首先是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思想的深刻了解。他们的西学知识主要得自译本西书，而没有像伊藤博文那样留学外国，在阐述变法理论时只好借助于今文经学，形成不中不西、中西杂糅的思想，以致被顽固派旧经学家斥为篡改孔学，就连支持变法的翁同龢也认为康有为的著作不过是“说经家之一野狐禅”。伊藤博文等人进行维新时有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人数众多的留学生群是维新事业的骨干。康梁变法时，中国留学生不仅人数少，而且回国后受压抑、地位低。康有为在西花厅问话后，发现清政府中枢机构竟然守旧盈庭，其顽固无知的程度超过原来的想象。为了减轻压力，此后他就不再提开国会、制宪法，只是建议开懋勤殿。近年新发现的史料表明，康有为搞变法不只是和平改革，他在暗中曾经策划过“围园执后”的武装政变，企图一举除掉阻挠变法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只是棋慢一着，全盘皆输。所以说，搞君主立宪的人，不一定是和平改良主义者。

封建社会实行人治；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法治，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相对扩大，这是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福祉。可惜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为狭隘的阶级利己主义蒙蔽了眼睛，他们把皇室和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全部满族的利益，忧心忡忡地说保国会“徒欲保中国，不保大清”（文悌语）；赌咒发誓：“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吾宁输润于外人，而不使奴隶分润。”（刚毅语）慈禧太后一翻脸，就把变法事业置于血泊之中。

戊戌政变以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倒行逆施，例如慈禧太后计划“废帝立储”，王公大臣统率义和团围攻外国公使馆和教堂，刚毅制造假造会激怒太后，载漪为促使儿子早登大宝，不惜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作为赌注向八国同时宣战。私欲加无知加盲动，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八国联军蹂躏京津及华北，甚至于东北，勒索4.5亿两赔款，加上四厘利息和39年付清，达到9.8亿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小额赔款，总数